

温州指数监测民间资本阳光化



本报记者 董碧水

时隔8个月,备受瞩目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细则终于揭晓。11月23日,温州市政府公布了这份名为《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的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改革力破“两多两难”问题

“实施细则”共12条,涵盖了规范民间融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深化地方金融改革,创新发展金融产品与服务、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等内容。

其中还涉及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支持民营资本进入证券、投资咨询等领域;争取在温州设立证券公司,支持更多的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到温州设立分支机构;积极开展产权交易市场试点,建立知识产权、企业产权、金融资产等产权交易市场,依法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试点,探索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转让试点;积极争取高收益票据等创新产品在温州先行先试等。

根据方案,温州市将经过5年左右努力,构建与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着力破解温州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民间资金多但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使金融成为温州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在促进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按照方案,温州将研究起草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建立民间融资法律保障;探索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引导融资主体特别是法人实体进行民间融资备案登记;开展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试点,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同时将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形成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也称“温州指数”),做好民间融资动态跟踪和风险预警,并在民间金融领域拓展电子商务应用。

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说,改革的核心在于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各类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组织,引导民间资金投向,畅通民间投资渠道,促使民间资金运用更加规范透明,进一步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

对照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12项主要任务,张震宇认为,温州金融改革细则的出台体现了政府鼓励发展新兴金融组织、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的决心,将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相关人士表示,以此为标志,温州金融改革将进入快车道。

“温州要争取做‘第一单’”

细读12条文,记者注意到,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施12条细则更多地侧重于发展地方金融,并且更加注重政府在金融改革中的

引导、促进以及服务职能。

如在“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发展方面”提出,推动设立各类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法人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支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设立100万元以下的小额农贷或微贷中心等专营机构。推动温州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增资扩股、上市融资。支持民营资本进入证券、投资咨询等领域,争取在温州设立证券公司,支持更多的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到温州设立分支机构。鼓励地方金融机构以控股、参股的方式探索综合经营。

而在“强化地方金融管理机制”细则中,则提出加强金融监管和管理部门的沟通协作,增强监管合力。温州市地方金融管理局要加强对创新类地方金融组织的管理,推进地方金融管理制度创新,明晰管理边界,明确管理责任。

“开展个人境外直投试点”是此次“实施细则”中引人关注的一个焦点。

细则提出,在国务院统一部署领导下,探索以人民币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规范便捷、有序可控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监管体系,制订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健全境外纠纷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信息与咨询服务,落实各项便利举措,推动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稳步发展。同时,鼓励对外投资主体多元化,带动民间资本在更广泛领域内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促进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

温州有60万海外华侨,本土民间资金8000多亿元,而温州人在海外投资热情颇高。据温州市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11年温州境外投资额5352.7万美元,外汇资金汇出2139.04万美元,人民币境外投资176.7万美元,对外担保450万美元。

但张震宇表示,该试点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出台还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行长吴国联称,温州已制订完成个人境外直投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细则,在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同意后已上报国务院。

据悉,除温州外,上海、天津也在争取个人境外直投试点。吴国联说,个人境外直投是外汇管理体制重大改革,非常慎重,国务院要专门部署研究,即便批下来,也不一定只有温州一地,“但温州要争取做‘第一单’”。

要实现民间资本的阳光化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称,温州金融改革需要解决的就是“三个不协调一个缺陷”,即:“地方金融机构与在温州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协调、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发展不协调、银行机构与非银行机构不协调”;“一个缺陷”是指,此前温州没有形成地方性的金融监管体系。

张震宇表示,针对上述问题,温州金融改革需要建设四大体系,即地方性的金融服务体系、区域性的资本市场体系、银行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体系和地方的监管体系。

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借贷无门,民间借贷多半只在地下运行,民间资本投资无门,总是遭遇种种障碍。张震宇说,温州金融改

革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使民间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作用的同时,利用金融杠杆作用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事实上,以打造“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和“民间财富管理中心”为重点,温州金融改革也强调了要充分发挥充满活力的、与温州经济环境相适应的各类民间金融平台,着力破解温州市经济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中小企业多但融资难、民间资金多但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

这其中,包括了“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民间资金根据有关规定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探索小额贷款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稳妥发展民营第三方支付机构。支持民营融资性担保公司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发起设立区域性、专业性保险公司,或参股保险机构。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等。

细则明确了村镇银行发展3年行动计划,包括加快村镇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引导村镇银行向乡镇延伸网点,覆盖主要乡镇;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优先批量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试点部分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按规定改制为村镇银行。

细则还鼓励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比如以地方政府债务率作为控制指标,探索符合条件的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私募债券,争取高收益票据等创新产品在温州先行先试。

提出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开展产权交易市场试点,建立知识产权、企业产权、金融资产、排污权、水权、碳排放权、低碳技术、农村土地承包权、林权等产权交易市场,依法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试点,探索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转让试点等。

“温州金融改革的一大任务,就是要实现民间资本的阳光化。”张震宇认为,只有在强化市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前提下规范发展起来的民间金融,才能使温州民间资本走向“阳光化”真正成为可能。

“温州指数”将在本月底下月初发布

张震宇透露,今年以来,温州共吸收34.7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小额贷款公司。另外,有两家农村合作银行改革的方案已经完成。比如,鹿城合作银行由原先17亿元的资本金,增加到30亿元,当中的12亿元增量全部来自民间资本;龙湾合作银行由原先不到10亿元的资本金,计划吸收民间资本至22亿元。他还强调,将吸收民间资本组建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

温州金融改革破题8个多月来,温州一批直接融资项目也是收获颇丰。张震宇说,截至目前,已有4家本土公司先后上市,总融资达34亿元。两家国有公司通过发放私募债券,融资27亿元。“就在11月22日,深交所又将第一单定向私募债发放给了温州。”

据介绍,为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未来温

州将推出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的“温州指数”,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做好民间融资动态跟踪和风险预警。“温州指数”将在本月底或12月初发布。

指数模型由上海和浙江有关部门和专家设计提供,刚开始将每周发布一次,下一步将逐步缩短发布时间,做到实时发布,引导民间融资,进行风险预警。

“温州指数”方案具体将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是由温州市设立的几百家企业监测点,把各自借入的民间资本利率通过各地方金融办不记名申报收集起来;二是对各小额贷款公司借出的利率进行加权平均;三是融资性担保公司如典当行在融资过程中的利率,由温州经信委和商务局负责测报;四是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实时利率。

此外,根据“金融改革细则”,在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方面,还将研究起草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建立民间融资法律保障。探索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引导融资主体特别是法人实体进行民间融资备案登记。开展民间借贷服务中心试点,引进一批中介机构入驻,提供民间借贷登记、合约公证、资产评估登记等服务,引导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

“同时,温州正在起草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争取明年通过浙江省人大列入一类立法。”张震宇说,在这段等待的过程中,温州将起草“1+7”地方监管暂行办法,对每一个有地方金融管理的部门,其主要监管的内容都要做出详细的实施方案。

本报杭州11月26日电



11月26日,市民在沈阳和平南大街“微自行车道”上骑行。日前,近千米的“微自行车道”亮相沈阳和平南大街,专门供骑车者通行。

张文魁撰(新华社发)

价格战伤筋动骨 技术受制于人 人才“转会”频繁

LED行业如何突出重围

本报记者 刘芳
实习生 惠贞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获悉主营LED显示屏的深圳市浩博光电有限公司因拖欠巨额供应商货款和员工工资及提成而陷入债务纠纷。这是继去年深圳钧多立实业有限公司、博伦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今年愿景光电有限公司关门停产后又一家亿元级LED企业陷入经营困局。

今年以来,深圳LED企业倒闭或停产的消息时有出现。6月29日,曾经在业界“小有名气”的深圳市愿景光电有限公司突然宣布破产,这家在2007和2008两年销售额共达2.6亿元的LED显示屏企业,因经营不善、产品价格导致利润率低等问题,最终没能逃过破产的命运。

在此之前,深圳钧多立、深圳市博伦特等在中国颇具规模的LED企业先后倒闭,原因都无外乎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

“缺乏核心技术创新的LED企业,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深圳市LED产业联合会副会长庞桂伟坦言,中国LED行业已经进入微利时代,虽然《半导体照明科技发展规划“十二五”专项规划》明确了推动中国成为该行业全世界前三强的诱人前景,但深圳这样的LED产业强区,却也不得不在全国率先经历“黎明前的黑暗”期。

根据深圳市LED产业联合会的统计,深圳共有1800家LED企业,约占全国LED企业总数的60%。2011年这些企业的产值达到700亿元,同期整个广东省LED行业的产值近1500亿元,深圳约占了全省的一半。目前全国LED上市公司总数约20家,深圳就占了10家左右。一定程度上说,深

圳的LED行业对全国LED产业都有着标本性意义。

产业进入微利时代

中国LED行业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LED(Light Emitting Diode),就是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固态的可以直接把电转化为光的半导体器件。

“早期能进入这个行业的企业非常少,1994年的时候全国都没几家,深圳更是只有两三家”庞桂伟说。“当时,由于关键技术研发困难,能够生产LED的企业几乎都要具备研发能力,尤其是控制技术只掌握在少数企业手里”。

上世纪90年代,LED就作为“稀缺品”只存在于银行、车站等少数场所,并且由于原材料价格较低,关键技术研发困难抬高了终端价格,导致市场上LED产业成为“显贵”。

但企业间的竞争加剧了LED市场的平民化。据介绍,从1997年开始,市场上开始出现有单色色控制卡等关键技术的技术转让现象,到2001年就发展到连彩色控制卡都在市场上公开售卖的阶段。

到2006年,控制卡技术逐渐被批量市场化后,LED产业的关键技术研发成本得到了最彻底的降低,中国LED企业数量开始呈几何级增长。2008年北京奥运等一系列大型活动,更催生了LED企业的快速发展,并在2009年达到高峰状态。

“从2007年到2008年,LED显示屏价格较高,利润空间较大,各企业之间产品价格差距也很大,随着消费者对产品质量重视度的不断提升,LED产业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一些中小型企业受到价格、规模等的冲击力度加大,这是一些中小型企业倒闭的最根本原因”,庞桂伟说。

深圳钧多立实业有限公司的倒闭就颇有代表性。曾为深圳光电子十强企业之一的钧多立实际注册资本只有2000多万元、年销售额不到2亿元,却在全国拥有4个生产基地,并在2010年与成都市双流县政府签订了投资额为4亿元的LED封装应用项目的建设协议。但劳动力与原材料成本增加、技术创新度的欠缺导致其核心竞争力不足,加上盲目的扩张,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令钧多立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

深圳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王殿甫表示,在钧多立、博伦特、愿景光电这些小有规模的企业相继破产的背景下,倒下的不知名的小企业也不在少数。LED显示屏行业洗牌时机已成熟,一旦企业出现经营上的重大失误,就会被迅速吞噬。

庞桂伟认为,LED行业核心技术缺乏、创新能力不足、市场无序竞争,桎梏着LED显示屏行业的发展。LED产业价格已经进入“微利”时代,必须在产品创新上进行突破。

“品种齐全”的困惑

庞桂伟的另一个身份是LED企业、深圳市通普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在他看来,由于2008年奥运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的利好,在金融危机中大多没有受到负面冲击的LED行业,反而在这两年遇到了难题。

企业之间的价格战越演越烈,每个阶段价格都在以20%到40%的降幅下降。“很多厂家有10个点的毛利就已经很不错了”,庞桂伟坦言。

“比如,按照同一类品种来说,每一平方米的价格去年还是6000元左右,今年

就不得不降低到3000元到4000元左右。”

很多LED照明产业都面临“品种齐全”的困惑,看到灯泡好卖,就去做灯泡;有部分射灯订单,就大量做射灯。实际上有创新的企业才有产品定价权,才会有利润。但是,有创新的LED企业不得不经历一个难言的困惑:每当一项技术难题被攻破,需要申请专利保护才能推向市场时,往往需要经历一年半的申请周期,而在这段时间内,新产品很容易被同行抄袭,很快失去价格竞争力。

“难道新产品研发出来非要等到一年半以后才能上市?”庞桂伟觉得,对于目前的LED企业,要求它永远都是领跑者,每年都有新产品问世,太难了。新产品一经研发成功,就应该快速推广,在一两年内收回成本,加速竞争,才能快速创新,从而发展整个产业。

不仅如此,照明产业中的发光晶片等高新技术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使得国内LED照明产业处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从而造成成本过高,市场推广步履维艰。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些企业资金投入有限,一旦资金用于研发,便会降低推广力度,反之亦然。

企业为人才“转会”伤脑筋

要克服这些瓶颈性难题,单凭一家企业很难成功。

比如价格战问题,在“品种齐全”的困惑来临时,确实要求企业要有清醒的头脑,专注于某一方面的能力建设。比如,通普科技就专注于生产环形灯和日光灯具,从“价格战”中突围出来。今年年初,通普科技凭借其产品创新度以及相对于大企业灵活性高等特点,从8家竞争企

业中脱颖而出,斩获欧洲一张近45万支的LED照明大订单。

再比如人才制约因素。作为新兴行业,中国的大学课程中,LED相关专业设置落后,直接导致了研发人才的欠缺,这也造成企业用人成本过高,企业动辄还要为人才“转会”伤脑筋。

另外,由于深圳市的中小企业大多在原特区外,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服务无法满足高精尖人才的需求,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了人才难招的问题。

庞桂伟表示,LED照明行业目前仅仅局限于政府工程等方面,市场需求尚未打开,而对于有实力的LED企业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质量有保证的情况下,市场布局如何安排将会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随着政府对节能减排的号召,LED照明行业的前景也为LED企业带来了“曙光”。今年年初国家发改委批准深圳等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深圳碳排放交易所的消息显示,目前深圳市政府正在加紧制订相关方案和定价机制,之前的自愿交易在新规实施后将变为强制性。这对于推动LED节能产品在企业中的普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从2011年开始,由于节能灯原材料价格上涨,能直接电能转化为光能的LED灯正受到市场认可。节能灯的主要原料为荧光粉,2011年以来,受其原料稀土价格暴涨影响,荧光粉价格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大幅上涨10余倍,从年初每千克250—300元,最高涨至每千克3000元以上。

与之相反,最近一两年,LED灯的价格一直在下降,性价比越来越高。“因为技术的成熟,以及上游原料价格的下降,LED灯的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深圳一位LED生产厂家的有关人员这样解释。“LED灯单价比传统节能灯贵,但随着LED光源主要原料蓝宝石衬底的降价,LED照明芯片、器件价格快速下降”。

“接下来,LED企业应该走一个品牌化道路,引导消费者使用LED照明产品,让LED走入千家万户。”

个税改革应着眼于大局



李 宁

在11月24日举行的第二届首都金融财税论坛上,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程法光发言称,应当继续提高个税起征点,并着重堵住征收漏洞。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会副会长施正文则表示,赞成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来调节税收,并称这“实际上是给富人减税”。(人民网11月26日)

关于个税起征点提高以及推进个税改革的争论由来已久,观点较为分化。从局部的角度来看,每一种观点都有一些道理。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从改革发展的全局来看待个税改革这一具体而又关乎民生的重要改革。笔者认为,目前推进个税改革,不能只从局部出发,不能只从简单的减负来看待和讨论个税改革,个税改革必须结合总体改革布局,必须从改革大局出发进行顶层设计,深入推进。

那么,当前个税改革面临的改革大局是什么呢?

一是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发展实力的大局。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除了依靠经济发展之外,别无它法,具体一点说,就是经济的细胞——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要强。虽然提高个税起征点能够客观上增加居民收入,但是与翻番目标任务相比,靠个税起征点提高增加居民收入可谓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当前财税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来做大文章,换句话说推进“营改增”改革、消费型改革、资源环境税制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改革等改革,上述这些改革对于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税收收入占比不到7%的个人所得税改革。从目前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下,经济界人士和媒体更应该关注大块头的“营改增”、消费税等改革,而不能紧盯看“芝麻大小”(从收入来说)的个税。

二是构建促进社会公平机制的税收制度改革大局。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准确理解十八大对财税体制改革的布局,其着眼点有两个,一个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个是社会公平。具体到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制度重要的税种个税来说,应在稳步推进低收入群体综合税负降低(综合税制改革)的情况下,强化个税再分配调节功能,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当然,要实现再分配调节功能,离不开个税收入总量的增加。因为任何一个税种调控功能的发挥,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税收收入数额完成,一个只有几百亿元收入的税种是无法承担调控收入分配职能的。这样,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或许能够减轻一小部分中产阶级税负(7.7%的工资阶层),但是,一小部分人的收入提高与整个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大局重任相比,孰重孰轻?大家应该明白。

体制机制不合理是制约转方式的最大障碍,转方式必须深化改革。税收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制机制”中的一部分,必须通过改革来服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其自身改革必须服从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改革;作为税收改革一部分的个税所得税改革,更应如此。

银监会:信息时代银行传统支付受到挑战

本报讯(潘圆)“未来银行业面临很多挑战,最重要的是来自信息技术的挑战。在未来5年内,监管者也会对给予很大的关注。”在11月24日召开的2012第一财经年会·金融峰会上,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表示。

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后,银行业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3个方面。第一,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银行自身传统业务受到挑战,一些公司开始做移动支付业务,做手机银行,或者在社区网站筛选客户,实现对商家的选择。由此带来的传统业务面临挑战。

一方面,信息技术能够降低银行相关业务的经营成本。信息技术也为银行向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提升技术也模糊了金融行业的界限。移动支付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移动支付和银行合作,一种是移动支付自己做。“我们讲的信息高速公路,使银行传统的支付受到很大的挑战。”

“银行业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来自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阎庆民说,经济全球化使得人才争夺日益激烈,经营管控的复杂化需要更高素质的人才,综合化经营也使得银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第三个挑战是对银行服务能力的挑战。

针对面临的这些挑战,阎庆民提出3点应对策略。第一,毫不动摇地服务实体经济。第二提升服务水平。“坚持多元业务并重,督促银行调整优化结构。银行业需要通过非信贷服务提高收益当中非利息收入的比重。”第三坚持服务规范。